

使命的认知与路向的转换

——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对俄罗斯现代化出路的探索历程

周来顺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 北京 100089)

提 要:以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弗兰克等为代表的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 面对着世纪之交俄国社会的动荡与精神的危机, 力图为俄罗斯探索出一条独特的现代化之路。在对俄罗斯现代化之路的理论探索过程中, 他们经历了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到中、晚期神学乌托邦主义的内在转变。但这种转变并非意味着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简单质疑与舍弃, 实则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所包含的异化理论、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想社会图景建构等始终是高度认同的。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对俄罗斯现代化出路的探索虽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但在此过程中, 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挖掘、对人的独特内涵与精神价值的强调、对现代性出路的探索等, 是具有永恒价值的。

关键词:文化; 现代化; 乌托邦; 马克思主义; 白银时代宗教哲学

中图分类号: B512.4

文献标识码: A

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复兴运动中, 产生了一大批思想家, 如 H. 别尔嘉耶夫、C. 布尔加科夫、Л. 舍斯托夫、C. 弗兰克等, 以这些思想家为代表所建构的理论思潮被称为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白银时代宗教哲学不仅仅在俄国哲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如作为白银时代宗教哲学重要代表的别尔嘉耶夫被誉为“俄国的黑格尔”、“20 世纪最伟大的预言家”, 又如白银时代宗教哲学作为一个整体被誉为俄国哲学史上的“黄金时代”。而且, 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 他们的理论创作使俄国哲学真正地登上了世界哲学舞台, 并且他们中的许多优秀代表曾直接或间接地与胡塞尔、舍勒、海德格尔、萨特等 20 世纪哲学巨擘进行过激烈的论战。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具有着崇高的使命意识, 面对着世纪的动荡、时代的转换、精神的危机和价值的虚无, 他们力图为俄罗斯探索出一条独特的现代化之路。可以说, 这些思想家对俄罗斯现代化出路的理论探索, 既是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罗斯自身命运忧思的理论自觉, 又是旧俄知识分子自身命运的理论缩影。

—

西方思想家, 如齐美尔、韦伯、阿多诺、哈贝马斯、赫勒、鲍曼、吉登斯等, 都对“现代化”这一概念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但从整体上看, 现代化是现代性的表现, 是现代性在物质、制度、观念三个层面的增加与扩展。现代化是一种总体性的进程, 它是“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嬗变……其核心是人自身的现代化, 即人的存在方式或行为模式的根本转变”(衣俊卿 2005: 258—259)。依此理解, 俄国现代化开启的标志, 不应以彼得一世(1682—1725)

或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的改革为标志，源于两者的改革都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俄国政治上的君主专制制度和经济上的农奴制度。俄国的现代化之路，即从封建农奴制向现代国家的转变，应以 1861 年对农奴制等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为标志，并由此拉开了俄国现代化进程的帷幕。就总体而言，对俄罗斯现代化出路的探索，既包括实践领域的现实革命运动，也包括理论领域的学说路径探索。

1861 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宣布废除农奴制，这标志着俄国现代化进程的开启。农奴制的废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俄国从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逐步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由于这次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地主土地所有制和沙皇专制制度仍被保存了下来，这也就决定了俄国危机四伏的社会状况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俄国仍面临着从根本上消灭封建专制制度的历史任务。而到 19 世纪末期，也即白银时代宗教哲学产生之初，俄国的各种社会矛盾已十分尖锐与激烈，改革、战争、革命等主题频繁交替，俄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式。就此，恩格斯曾对当时俄国的社会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了俄国危机程度之严重、社会腐朽之黑暗、人民压迫之深重，以至恩格斯在 1874 至 1875 年写成的《流亡者文献》中，曾这样悲愤的指出：“没有一个别的国家像俄国这样，当资产阶级社会还处在原始蒙昧状态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寄生性便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整个国家、全体人民群众都被这种寄生性的罗网覆盖和缠绕。而这一切吮吸农民血液的吸血鬼，同运用法律和法庭为来保护吸血鬼的巧取豪夺的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没有丝毫利害关系！”（马克思 恩格斯 1995：275—276）正是基于对此的分析，恩格斯认为，“俄国无疑是处在革命的前夜。财政已经混乱到了极点。捐税额已无法再往上提高，旧国债的利息用新公债来偿付，而每一次公债都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只有借口建造铁路还能得到一些钱！行政机构早已腐败透顶，官吏们主要是靠贪污、受贿和敲诈来维持生活，而不是靠薪俸”（马克思 恩格斯 1995：284）。

面对俄国社会所面临的深重危机与灾难，发轫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意识到并自觉地担当起了自身的历史使命，力图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自由与专制等多种路向的探索与争论中，为苦难的俄罗斯探索到一条独特的现代化出路。在对俄罗斯现代出路的探索中，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重视基督教，特别是东正教的理论资源。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东正教不仅仅是俄罗斯民族，而且同样也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自觉的理论底色。无论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情怀，还是转变后的神学乌托邦思想建构，都是以基督教（特别是东正教）为精神根基的。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在对俄罗斯传统文化的探索中意识到，无论是就“东方还是西方的道路选择”、“传统与现代的主题转换”、“上层与下层的意识对抗”、“信仰与理性的无形角逐”等问题，其最终的交叉点都落在了宗教上，宗教是俄罗斯精神与路向的聚焦点。他们真切地意识到，宗教是俄罗斯的精神之根，宗教也同样是俄罗斯在动荡不安与时代转换中得以复活的精神所在。在他们看来，俄罗斯的社会变革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和生活的现象，而首先是一个精神的和宗教的现象，所以俄罗斯的复活需转向精神的深处。而转向精神深处不仅仅在于传统的东正教，更在于将自身宗教传统与多种文化资源的有机融合，从而在这种融合中实现自身的救赎。

在对俄罗斯现代化出路的探索过程中，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清醒地意识到对俄罗斯现代化出路的理论探索不应简单地纠缠于“东方还是西方”。他们意识到，俄罗斯现代化的道路既不是纯粹的斯拉夫派路向，也不是模仿的西方派路向，而应在对东西方文化资源的有机吸收与创造性中探索出俄罗斯现代化的历史道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认为，俄罗斯具有自身独特的使命，因而其通达现代化的道路也是独特的，“俄罗斯是伟大的东西方之结合，她是完整的、巨大的世界，俄罗斯民族包含着伟大的力量。俄罗斯民族是未来的民族。它将解决西方已无力解决，甚至从其深层来说都不能提出的问题。”（Н.А. Бердяев 2004：76）也正是基于对俄罗斯现代化出路的独特认知，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所建构的理论体系相对具有极其

强烈的末世论意识。无论是他们对历史、历史哲学的重视，还是对末世论与启示录的强调，实则都力图终结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以便使民众与国家获得终极的救赎。

从整体上看，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从其登上俄罗斯现代化出路探索的历史舞台之初就意识到，无论是醉心于旧有的民族理想，以满足于对俄罗斯自然属性的独断赞美，还是沉迷于西方的理想国度，以痴情于对西方理性主义的片面理解，实则都是危险的。他们认为，真正民族意识的觉醒不在于迷恋民族中黑影与混沌的自然力¹，而在于寻求到一种综合的、创造性的文化，寻求一个未来的、崭新的俄罗斯。正是在这种崇高而沉重的理论使命感召下，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毕其一生之力，力图从理论上为饱经苦难的俄罗斯探索出一条独特的现代化之路。

二

正如俄国著名哲学史家津科夫斯基所指出的那样：“20世纪俄国生活的特点，不仅仅是在社会政治领域的革命运动，而且还有……在宗教哲学领域的回响。”（В.В. Зеньковский 2001：711）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着世界的动荡与时代的转换，面对着“俄罗斯向何处去”的世纪追问，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力图从理论上予以回应。在对这一时代性任务的历史回应中，一方面，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并不是囿于东正教经卷和对原有思想家宗教哲学观点的重新注释和阐发，以此来寻求俄罗斯现代化的出路，而是站在时代的高度，以整个欧洲和世界文化的视野来思考与写作，以面对和回应时代的难题及其挑战；另一方面，他们在对俄罗斯现代化出路的探索过程中，并不是采取某种简单的外部置入或全盘西化方式，而是力图做到将俄罗斯自身传统与外在理论资源的有机结合，以此来克服由于社会动荡所导致的生存危机以及在精神层面所正在经历的、受虚无主义侵害的价值危机。

在对俄罗斯现代化出路的早期理论探索中，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发现了真理，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全部真理就是“为人的解放而斗争。他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奠基于这种认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工人的人的本质的异化、他的人性丧失、人性的异化”（Н.А. Бердяев 2004：98—99），而依托马克思主义学说所要建构的社会主义图景，则是“想把人从经济的奴役中解放出来”（С.Н. Булгаков 1991：209），从而使最终“不仅在观念中，而且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也应当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弗兰克 2000：162—163）。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认知，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力图通过将俄罗斯自身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多维嫁接来实现俄罗斯的现代化之路，从而提出了如“人格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等。他们认为，这种依托俄罗斯自身文化传统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所进行的多维嫁接与探索是具有合理性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应有之义的“合理”延伸，是“正统”与“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正如卢卡奇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姑且假定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即使这点得到证明，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种新结论，放弃马克思的全部论点，而无须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所以，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卢卡奇 1992：47—48）与卢卡奇一样，他们同样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一种僵化的教条，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生硬照搬就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于对其本质精神的深度理解与把握。

我们知道，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在对俄罗斯现代化出路的早期理论探索过程中，大多因批判沙皇专制制度和追寻马克思主义而遭到逮捕和流放。但奇异的是，这些思想家在经历了马克思主义短暂的迷恋与追寻后，又都纷纷转向唯心主义，转向宗教哲学，转向神学乌托邦的理论重构。在对俄罗斯现代化出路的理论探索中，所经历的从马克思主义向唯心主义转变的标志性事件，就是1909年以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弗兰克等为代表所合作出版的

论文集——《路标》。《路标》文集的出版在当时的俄国社会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被认为是“由一些最有才华，最聪明的知识分子写成的一份卓越的文献。但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学者阶层反叛的事件’”。这本文集论述的视野宏大，“在欧洲整个社会向善的自由主义思想中，几乎没有一个重要论点不曾被这些作家所采用或被他们以惊人的洞察力所预见”（汪剑剞 2007）。《路标》文集的作者们从各个角度对 1905 年俄国革命的失败进行了反思。这种反思更多地表现为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捍卫与对革命的抵触，可以说《路标》是以“激烈、几乎激昂的情绪撰写的，但却不是为了揭露，而是作为一种号召。在最尖锐的揭露中只是表现出真诚的忧患，于是揭露本身成为号召，号召投身于事业和创造。这是一本热情洋溢的书，一本引人入胜的书，一本呼吁的书，而不仅仅是进行否定的书。该书是开始的，而不仅仅是关于终结的书”（弗洛罗夫斯基 2006：559）。在文集中，他们重新思考俄罗斯的命运、知识分子的使命与局限，呼吁放弃激进的社会变革，提倡精神的新生。他们认为革命是恐怖的，是以流血的方式所达到的一个虚假的“人间天堂”。他们力图通过精神的新生而达到重构社会形态，建筑精英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以消除在革命中个体被集体所吞噬的悲惨命运等。针对以别尔嘉耶夫等为代表的“路标派”言论，列宁立即发表了《论〈路标〉》一文予以反驳，指出：“《路标》的作者们以整个社会流派的真理思想领袖的身份出现，扼要地草拟了一整套哲学、宗教、政治、政论等问题的百科全书，对整个解放运动，对俄国民主派的全部历史都做了评价……《路标》是俄国立宪民主主义和一般的俄国自由主义同俄国解放运动及其一切基本任务和根本传统实行彻底决裂这条道路上的最突出的路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 1983：171—172）不但如此，列宁指出，这本文集“自始至终贯穿着坚决反对唯物主义的思想，唯物主义被宣布为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和‘最简单最低级的空论’”，他们拼命地攻击无神论，并“十分坚决彻底地力图恢复宗教的世界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 1983：172，173）。

实则，1905 年的这场革命对旧俄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造成了冲击，他们或是走向某种幻灭与绝望，或是转向犬儒主义式的超脱，或是冷漠地认同社会现实，或是走向无自我的群体运动来寻求慰藉。而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则与上述知识分子不同，在经历了 1905 年革命之后，他们并没有沉迷不振，而是通过忏悔与反醒，来重新反思和探索俄罗斯现代化出路的路标。从 1905 年到 1917 年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之间，实则这些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是极其痛苦的。这种痛苦源于，一方面，他们认识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及其胜利的不可避免性，认识到“俄罗斯文学及其思想证明，在帝制俄罗斯已不存在一个完整的文化，表现为在民众与知识分子之间有不可弥合的鸿沟，旧的制度不再具有道德的根基。理念和力量的文化守旧思想在俄罗斯已经不存在。所有人都幻想某种形式的集体主义，作为横跨鸿沟的桥梁。所有的事件都在向革命的方向趋进”（Н.А. Бердяев 1997：325）。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从精神深处真正接受这场革命，在他们看来，这场革命是俄罗斯传统文化断裂的标志，这场革命最终将会把俄罗斯带入集权主义的社会，最终将导致虚无主义在俄罗斯的盛行。

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及其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不认同是多方面的，从理论上，源于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包含着经济决定论和虚幻的乌托邦色彩；而从实践上看，则源于他们认为真正的革命应是精神的革命、新人的再生，而激进的暴力革命可能导致俄罗斯传统文化根基的断裂、虚无主义的盛行与新的集权主义的生成。正是基于此，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开始逐步脱离对俄罗斯现代化出路探索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路向。在此需强调指出，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所经历的这种理论转变历程，并非意味着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简单抛弃，实则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异化理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对理想社会图景的寻求等是高度认同的。在经历了这种转变后，他们已将马克思主义学说内化到自身日后所欲建构的理论体系之中。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言：“我终生对马克思主义都怀有特殊的感情。至今依然如故。”（别尔嘉耶夫 2007：105）

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并没有改变自身的立场。苏维埃政府认为，以别尔嘉耶夫、弗兰克、布尔加科夫等为代表的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是没有希望转向共产主义的反动分子，因而于 1922 年夏秋之际将他们驱逐出境。在别尔嘉耶夫看来，满载着 160 余名没有希望转向共产主义的旧俄知识分子的“哲学船”驶向欧洲，是俄罗斯“文化传统中断裂的标志之一”。在被驱逐国外期间，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并没有停止对俄罗斯现代化出路的理论探索，而是在对原有理论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上，转向了神学乌托邦体系建构，从而建构了形态各种的神学乌托邦体系，如别尔嘉耶夫和布尔加科夫所强调的“新基督教”学说、弗兰克的“爱的宗教”学说、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圣灵的王国”等，都是这一路向的集中体现。我们之所以将这些体系称之为神学乌托邦路向，一方面源于这些体系都是以基督教（特别是东正教）神学作为自身学说的理论底色，另一方面则源于在这些体系之中都存在着脱离于现实的理想化倾向。实则这种神学乌托邦色彩不仅仅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而且也是整个白银时代景观的总体性特征。正如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白银时代文化中的启示录式想象，从小说中的启示录形式到救世计划，其中艺术与宗教和政治联手形成了拯救个人的可行性方案并描绘了未来世界的乌托邦蓝图。”（林精华 2001：11）在这些形态各异的神学乌托邦理论体系中，虽侧重点不同，但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人的独特内涵与精神价值、神人性、末世论、宗教间的联合等。

三

可以说，自 1861 年农奴制改革以来，俄罗斯便面临着如何实现现代化出路这一问题，而这一问题又可简单地归结为俄罗斯的现代化是依托于自身的传统还是背弃传统的西化，这一问题始终困扰与折磨着俄罗斯思想家。而我们看到，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在对俄罗斯现代化出路的理论探索中，他们已自觉或不自觉的提出了一条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现代化模式。他们在对现代化的理论探索中，一方面，与西方主流现代化探索路向相同，都注重人本思想，注重平等、自由、博爱、正义等精神性内涵；另一方面，在对待理性的态度上却又与西方主流现代性探索路向不同，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拒斥理性的，他们注重的是信仰、非理性、整体性、生命经验等。他们在对现代化出路的理论探索中，始终立足于自身原有文化传统，从而力图通过将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来实现俄罗斯的现代化出路。

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对俄罗斯现代化出路的理论探索，是在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中展开的。虽然这种探索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仍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首先，对人之独特内涵与精神价值的守护。从总体上看，面对着人类在 19 世纪末至 20 初全球性的社会动荡与时代转换，思想界从总体上表现为以人本主义、科学主义、新基督教神学等路向来予以回应这一危机。而白银时代宗教哲学作为人本主义思潮的重要一维，他们在对俄罗斯现代化出路的理论探索中，始终强调和守护人的独特内涵与精神价值。第一，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强调人的创造精神，认为创造意味着超越、解放、革命，创造意味着新事物的产生。第二，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强调人的自由维度，他们反对传统意义上将自由与必然性相对等的理解。在此意义上，他们特别批判了黑格尔的自由观，认为自由不是对必然性的认识，认为“自由是前世界的，非被造的”（舍斯托夫 2005：69—70），“自由先于世界而存在，它植根于原始虚空中”（Н.А. Бердяев 1993：112）。第三，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普遍重视人的精神性，认为精神是具有神性的，是“生存的最高形式”（别尔嘉耶夫 2003：107）。但他们认为精神不能脱离于宗教的维度，认为脱离于宗教的维度，精神将不会具有神圣性与超越性内涵。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力图通过这种对自由、精神、神人性等的理解，来彰显人之主体性、创造性。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对人之独特性的强调，对人之精神价值的守护，即便放在整个 20 世纪的思想史上，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其次，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独特探索。自马克思主义学说产生以来，就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不同解读。这种解读虽有正、误之分，但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看，确实都从不同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且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正是在这种不同路向的理论探索与丰富过程中，才使马克思主义学说不断发展、壮大，并且直至今日仍具有极其强大的生命力。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在对俄罗斯现代化出路的早期理论探索中，力图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学说与自身文化传统相结合的方式来探寻俄罗斯的现代化出路，从而提出了如“人格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等。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探索是具有一定价值的，这种探索不但构成了20世纪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众多解读与探索中的重要一维，而且客观上丰富与推动了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路径。而且，最为重要的则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在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探索过程中，他们始终强调自身文化传统，强调如何实现自身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学说之间的有机结合，以防止文化根基的断裂与虚无主义的盛行，这是具有极强的现实参照意义的。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探索，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是具有相当的理论高度与现实意义。当然，不可否认，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在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多维嫁接中，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大量误读。

最后，对现代化出路的独特理解。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在对俄罗斯现代化出路的探索过程中，一方面，重视文化价值的作用。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认为“文化是与个性和精神相关”（别尔嘉耶夫 2002：143），文化是“在社会——历史生活中所实现的客观价值的总和”（弗兰克 1999：55）。他们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血液，而任何对文化的任意切割与断裂都将会导致民族的无根基性，导致虚无主义的盛行。因而，他们在对俄罗斯现代化出路的理论探索中，始终重视文化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重视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我们看到，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在对俄罗斯现代化出路的理论探索过程中，始终强调应将俄罗斯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资源进行有机结合。无论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路向，还是转向后的神学乌托邦路向，实则他们都十分重视俄罗斯传统文化资源，特别是以东正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资源。实则对此点的认知在当今已达成某种共识，即在现代化出路的理论探索过程中，如何做到民族传统与现代文化资源的有机结合，是成败的关键。

正是基于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对俄罗斯现代化出路探索的重要意义，所以在当今俄罗斯兴起的众多哲学思潮中，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占据了特殊的位置，理论界甚至把振兴俄罗斯哲学和俄罗斯现代化出路的希望寄托于此。这种寄托不但表现在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自身著作和相关研究著作的不断再版，而且还表现在当今俄罗斯学界对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的称谓上。如他们把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的肇始者索洛维约夫看成“民族的骄傲”、与康德和黑格尔齐名的思想家，他们把别尔嘉耶夫看成“20世纪的黑格尔”、“20世纪最伟大的预言家”，他同更早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同时代的舍斯托夫则一道把“俄国变成存在主义的故乡”（贾泽林 1994），甚至他们把作为一个整体的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喻为俄国哲学史上的“黄金时代”，等等。当然，这种复兴与回归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了当前俄罗斯学界急切、焦虑的心理。面对着前苏联解体后所带来的文化价值真空与虚无主义的盛行，面对着俄罗斯现代化出路的重新选择，他们希望俄罗斯能尽快从“混乱”与“迷茫”中找寻到现代化的出路。由此，他们力图通过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的复兴，来为俄罗斯现代化出路的探索提供某种可供参照的路径选择。

总之，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在对俄罗斯现代化出路的探索中，虽表现出了自身的限度，这种限度不仅表现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误读、对神学乌托邦的过多期许，更表现为他们的学说是与当时俄国的现实相脱节、与民众相脱离的。可以说，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在对俄罗斯现代化出路的理论探索中，他们更多的是表现为一种思想家头脑中的自我幻象，他们是在思想中完成了俄国的现实革命。由此，也导致了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对俄罗斯现代化出路的探索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导致了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自身的悲

剧性命运。但与此同时，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在现代化出路的理论探索中，他们对人之独特内涵与精神价值的守护、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探索等，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这种积极意义并不因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的逝世及其学说的终结而终结，而是在新时期以新的形式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附注

1 别尔嘉耶夫曾指出，在俄罗斯民族中隐藏着一种黑酒精神，这种黑酒精神是一种原始民族的狄奥尼索斯迷恋，它表现为黑色的、恶劣的、阴郁的、不透光的自然力，是一种非理性因素。这种俄罗斯黑色自然力，以恶劣的、愚昧的迷醉来麻醉俄罗斯人的精神，并从民族生活的底部开始不断地诱惑和腐蚀着风向。俄罗斯未来的精神生活，应克服这种非理性的黑色自然力。

参考文献

- [1] Бердяев Н.А. Философия свободного духа[M].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3.
- [2] Бердяев Н.А.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M]. Москва: ЗАО «Сварог и К», 1997.
- [3] Бердяев Н.А. Русская идея[M]. Москва: ОО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 2004.
- [4] Булгаков С.Н. Христианский Социализм[M].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Сибир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91.
- [5] Зеньковский В.В.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M].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аритет», 2001.
- [6] 别尔嘉耶夫. 论人的奴役与自由[M]. 张百春译,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2.
- [7] 别尔嘉耶夫. 末世论形而上学[M]. 张百春译,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3.
- [8] 别尔嘉耶夫. 自我认知[M]. 汪剑钊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9] 弗兰克. 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M]. 徐凤林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 [10] [俄]弗兰克. 实在与人[M]. 李昭时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 [11] [俄]弗洛罗夫斯基. 俄罗斯宗教哲学之路[M]. 吴安迪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12] 贾泽林. 当今俄国哲学[J]. 哲学动态, 1994 (4).
- [13] 林精华编译. 西方视野中的白银时代(下卷)[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1.
- [14] [匈]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M]. 杜章智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 [1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6] 舍斯托夫. 思辨与启示[M]. 方珊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17] 汪剑钊. 我祈祷的内容远比幸福高尚[J]. 文景, 2007 (1).
- [18] 衣俊卿. 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C].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Recognition of Mission and Change of Direction — the way-out for Russia's moderniz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religious philosophers of the Silver Age

Zhou Lai-shun

(Center for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Postdoctoral Mobile Research St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Abstract: Religious philosophers of the Silver Age represented by Nikolai Alexandrovich Berdyaev, Mikhail Afanasyevich Bulgakov and C.Frank. attempted to find a special way out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Russia facing the chaos of time and spiritual crisis. In their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most of these thinkers had experienced the internal transition from the early Marxism to the later theological Utopianism. These religious philosophers of the Silver Age did not simply abandon Marxism. They all absorbed the principles of Marxism, including the alienation theory, the criticism of capital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better social picture. These religions philosophers failed to modernize Russia, but in the process, they explored Marxism, the unique connotation of spiritual value of man and the way-out for Russia's modernization. These have eternal value.

Keywords: Culture; Modernization; Utopia; Marxism; Religious philosophy of the Silver Age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 世纪初叶以来苏俄文化观的演变及其启示”(课题编号：12CZX00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53 批面上资助项目“现代性危机及其精神救赎——别尔嘉耶夫历史哲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013M530554) 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周来顺 (1981—)，男，黑龙江勃利人，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哲学学院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主要致力于俄罗斯哲学、文化哲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4-09-14

[责任编辑：惠秀梅]